

唯物史观视域下劳动性别分工的现实困境与未来指向

闫涛, 刘浩然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 劳动性别分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 与社会阶级关系密切。历史和现实的变化是推动劳动性别分工平等的基本条件, 而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常被看作为衡量一个时代是否文明的试金石。在唯物史观视域下, 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中心考察人类社会历史, 反思劳动性别分工的历史发展过程; 对劳动性别分工中女性的困境进行现实分析, 揭示其在性别分工中处于社会从属地位、分工模式僵化以及现实处境弱势等表征; 探索现代社会优化劳动性别分工的可行性, 在科学与技术、新型家庭文化、社会主体地位等方面, 尝试构建新型劳动性别分工体系。通过对劳动性别分工的分析, 由文本触及现实,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基于“资本—利润”逻辑而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剖析和改造, 以寻求人的解放、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关键词] 唯物史观; 劳动; 性别分工; 人的发展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25.02.006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25)02-0050-07

人类劳动的性别分工从远古发展至今, 从传统走向现代, 经历几万年沧海桑田的变化。在唯物史观视域下, 劳动性别分工深植于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的结构之中, 是个体基于性别差异, 从事人类物质产品生产及自身再生产的社会分工形式。关于“性别分工”论题的探讨一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注的, 最早可以追溯到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 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1]334} 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 女性原有的权利逐渐被重构, 社会地位趋向依附化。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 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 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女性的发展和自主权。因此, 从唯物史观来看, 女性社会地位和权利的削弱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制度变化有着密切联系, 劳动性别分工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制度运作过程中的社会结构问题。

一、人类社会劳动性别分工的历史分析

劳动分工的演变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之一。从唯物史观视角出发, 劳动性别分工与社会阶级关系密切, 其本质是私有制下阶级剥削与压迫的表现形式,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呈现出差异性特征, 这种特征根本上是由人类劳动实践活动

的需求和特定的社会生产结构所决定。

(一) 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性别分工

早在前资本主义社会, 分工便自然形成, 并拥有自己独特的功能, 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重要基础。由于原始社会早期生产力较低, 人口资源相对较少, 自然灾害频发, 而人们又没有足以抵御生存风险的生产生活方式, 一部分人便组成相应的共同体从事劳动, 一同解决生存困境。恩格斯指出: “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 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 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2]78} 在原始社会, 大部分社会关系是受血缘、亲缘以及地缘等影响而建立的一种生物学和性的繁殖上的社会分工——男性大多从事狩猎、捕鱼、制作工具等主要的物质生产活动, 女性大多兼顾家庭从事生育、纺织、物品加工等非主要的物质生产活动。在这种情况下, 男性占据着社会生产的主导地位并掌握着生产领域的主导作用, 而女性既要担负繁衍后代的责任, 又要参与辅助性的社会劳动, 这进一步加剧了最初的劳动性别分工不平等和阶级压迫。

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以及母系氏族的瓦解促使氏族社会从“从妻居”到“从夫居”, 男性开始具有支配家庭财产的权力, 同时也具有支配家庭

[投稿日期] 2024-04-12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 TJKS22-008); 天津大学自主创新基金(编号: 2024XMZ-0049)

[作者简介] 闫涛(1978—), 男, 天津人,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社会发展理论。

成员的权力,并逐渐掌握着家庭和社会的核心生产力。恩格斯认为:“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2]68} 随着城邦制度和家庭制度的出现,“父权制和阶级关系都有其在社会历史中的发展变迁”^[3],女性的权利逐渐弱化,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她们丈夫和父亲的地位及财富,其人身自由和权利很大程度上受到男性的控制和限制。同时,由于父权制统治下固有的社会意识,女性被期望保持贞洁,避免与其他男性有任何形式的接触,这导致了社会对女性在伦理道德方面有着强烈约束和限制,进一步使女性的自由和权利受到严重的侵害。

(二) 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性别分工

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妇女逐渐参与到工厂和劳动力市场中,劳动性别分工开始成为一种支配并剥削妇女的阶级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者是把他的妻子看做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4] 资产者将妇女视为生产工具,将家庭视为经济单位,进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妇女劳动力被视为廉价劳动力,其不得不从事“现代”家庭劳动,被用来支持家庭经济和本积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以利润为核心,过分追求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所以又进一步加剧了劳动性别分工的不平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进一步指出:“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2]87} 父权制度的存在也使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面临着额外的压力和负担。资本主义经济与父权制的结构性“合谋”,使妇女在从事社会生产的同时,承担家庭责任也变得更为困难。妇女儿童的生产生活困境在《资本论》中也有大篇幅文字描述,如果从劳动理论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就必须进行劳动主体的性别考察,这一路径与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逻辑相一致,其理论内核为性别分工的阶级关系批判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从简单协作生产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生产的发展过程中,劳动性别分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进,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角色和地位通常比男性低,同时还在家庭中担负着大量不可或缺的劳动。“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1]536},

资本家通过将生产过程分割成许多简单的劳动环节,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利润。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生产活动的根本动机是追求利润和个人利益,人的行为主要表现为追求经济上的成功和财富的积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某些部门中,少女和妇女也整夜和男工一道做工。”^{[5]298} 资本家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更多地使用女工代替男工,并以工厂法的形式恶意加剧性别的差异性,吸纳廉价的妇女劳动力取代男性的劳动生产,如从事一些操作大机器的岗位。可见,资本通过机器的使用完成对妇女劳动的占有,“机器使男劳动力贬值了”^{[5]454},进一步扩大了剥削领域并加深了剥削程度。

(三) 后工业社会的劳动性别分工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虽然仍坚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起点,但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在认识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偏离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逐渐放弃与马克思主义的结盟,转而关注身份政治和话语政治,以文化批判代替政治经济学批判,强调个体的身份和文化认同对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的影响,而不再基于阶级关系的分析研究性别问题。在《性别麻烦》一书中,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颠覆传统的现代主义观念中关于个体主体的稳固性和统一性等观点,转而注重对身体、性别和性别认同等议题的重新思考。后现代主义力求解构和重建对性别的理解,甚至彻底消除性别的存在形式,鼓励女性竭力避免失去自身独立性而成为丈夫的附庸,并创建了新的文化表述空间。可是,西方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后,没有深入阶级关系中探究女性劳动力市场与劳动性别分工之间的动态关联,忽视了现实中劳动性别分工带来的具体困境,也没有关注到在新自由主义思想下,劳动性别分工问题往往成为新资本积累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政策中“自愿地”、无限制地延长劳动时间,进一步将资本的残酷剥削视为工人的自主发挥,从而掩盖了资本积累的目的。

在后工业社会背景下,女性劳动被低估和忽视的同时,又被深度嵌入资本增殖的过程中,这使得劳动性别分工具有一种新表征,即这种分工已经成为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实境况。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代表南茜·弗雷泽指出,当女性主义正在从资本主义的天然批判者和抵抗力量变为新自由主义的同盟时,已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变化,“这一后果直接与女性主义关于正义社会的想象背道而

驰”^[6]。资本主义利用女性进步和性别正义的理念创造新的市场命题,将女性主义融入商业化的范畴,促成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开辟以及劳动力女性化的趋势,并试图美化资本对女性的隐性剥削。在弗雷泽看来,劳动性别分工平等的理想已经变成资本积累的手段。劳动性别分工平等的本质应当是争取自主和尊严的权利,而不是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牺牲品。因此,重新审视历史上不同阶段的性别角色演变,劳动性别分工不仅是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问题,更是由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所以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后工业社会中的劳动性别分工及其影响因素。

二、劳动性别分工中女性困境的现实分析

劳动性别分工不平等的问题,只有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才能得到合理的阐释。历史和现实的变化是推动劳动性别分工平等的基本条件,劳动性别分工源于人类的劳动实践活动,所以必然要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背景、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资本逻辑导致的这一问题进行剖析。

(一) 女性处于劳动性别分工的从属地位

唯物史观为考察阶级关系与性别分工的交叉性提供了理论框架。随着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演变,家庭关系也在不断调整和改变,“这遵循的是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7]。经济上财产关系的一系列变化促进着氏族继承制度向子女继承财富的方向转变,从而导致母权制度废除、氏族社会解体等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变迁。在父权制下,性别分工成为劳动分工的一部分,男性被赋予公共领域的责任,女性则被赋予家庭和生育的责任。恩格斯称:“阶级的形成的一切萌芽,还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2]185} 尽管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度和收入水平逐渐提高,但在一些行业和职位上,性别歧视仍然存在,女性的性别因素仍会影响工资的构成。女性主义者海蒂·哈特曼认为:“它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8]47} 一方面,传统的父权社会结构赋予男性经济决策和家庭决策的权力,而女性在经济上受到限制和压迫,面临着获得更少的机会和资源的可能,难以参与到平等的经济活动之中以实现经济独立;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男性更容易获得高薪、高地位的工作,从而被视为家庭的决策制定者和主要的经济依托,而女性通常被限制在低薪、低技能和不稳定的工作岗位上,在经

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被排斥和剥削。

劳动性别分工不平等正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共同作用的历史结果。如马克思所说:“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520} 在传统农业社会,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家庭成员的劳动力,人们依靠土地耕作、采集自然资源和狩猎维持生活,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通常是以家长为中心的家长权威制度,家长在经济生产中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而其他家庭成员则从属于家长的权威地位并遵循着其指导和决策。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工业化带来新的生产技术和经济组织形式,财富的生成不再局限于家庭内部,而是扩大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范围。这导致财产关系的重塑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社会结构中逐渐形成等级制度,并出现“私有财产”的概念。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面临不同程度的剥削和压迫。大规模经济单位的出现导致劳动力的专业化和分工更加精细,其运行往往需要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而男性更容易获得相关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占据更多的高级职位,被赋予提供经济支持和领导者的角色。劳动性别分工再次反映了经济体制的剥削性质,男性的劳动被高估和高价值化,女性的劳动则被低估和低价值化,致使女性在社会和政治领域被边缘化,并进一步反作用于日常生活的经济现实之中,这加剧了劳动性别分工的不平等。

(二) 女性处于劳动性别分工的僵化状态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性别分工是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反映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不仅是社会习俗的产物,更是能够满足资本积累和利润最大化的需要。社会学家通常认为,劳动性别观念中关于“分工”的意识是由社会文化建构的,而并非先天自然生成的。这种社会文化对社会性别影响的观点没有被置于社会经济关系中来考察性别的差异,仍然处于理论上的批判,并长期以来束缚着女性劳动者的思想。人类最初的劳动性别分工是为了维持种族生存繁衍以至不至灭亡的被迫的分工形式,是压制人自由本性的性别分工,“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2]78}。由于男女各自独特的生理构造,分工一开始就成为以繁殖为主要目的的性别分工。在女性主义经典著作《第二性》中,西蒙娜·德·波伏娃就明确指出:“最初,丈夫从一个陌生的氏族领来一个妻子;或者,至少两个氏族交换了贵重物品:一个氏族交出了一个成员,另一个氏族则

提供牲畜、果实或劳动作为回报。”^[9]这种方式同物与物的交换相类似,女性以私有财产的形式而存在,婚姻成为女性的灾难,女性像货币一样履行着传统的“自然职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婚姻关系更多地被视为两个家族之间的联盟,而非仅仅是两个个体之间纯粹的私人关系,女性被视为交易中的对象之一,缺乏对自己婚姻命运的直接控制权,更多地被动接受由男性家长主导的交易决策。因此,交易婚姻虽然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但是在其背后仍然是私有财产的交流。

劳动性别分工问题并非“二元”的对立,而是一个复杂且多样化的议题,是与阶级关系交错纵横、相互缠绕的多维体系。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性别是由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塑造和定义的概念,而劳动性别分工也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变化的,是不同性别在经济和生产活动中承担不同角色和责任的范畴。在承认男女之间存在自然的生理差异时,还要进一步将劳动性别分工置于社会经济关系中,深入理解性别问题与阶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现实的人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所以性别关系也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劳动性别分工正是基于社会关系的变迁而不断演化发展的。如果仅仅停留于文化批判、话语批判的层面,脱离现实实践的阶级关系分析讨论劳动性别分工问题,那么性别解放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2]78}。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媒体、教育和文化传播等途径强化性别角色,维护以资本逐利为核心的劳动性别分工,进而影响个体的职业选择,这也使得社会整体对性别不平等问题的接受度提高,阻碍性别平等的实现。在父权制的社会背景下,劳动性别分工本身是由男性主导,并趋向于对男性有利的方向发展,以至于女性在参与社会性别分工和家庭性别分工时渐染社会生产等级化。这种劳动性别分工观念通过文化传递逐渐凝结成相应的文化符号,并在上层建筑中形成一种巩固资本主义统治的文化机制。

(三) 女性处于劳动性别分工的弱势一方

在资本主义社会,家庭被视为私人领域,而生产则被视为公共领域。“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随着专偶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情况就改变了。料理家务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干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2]87} 当家务劳动从公共领

域转移到私人领域,妻子的角色也更多地被限制在家庭内部。在传统的劳动性别分工中,家务劳动实际上是一种私人劳动,“而这类私人劳动却不被社会所承认,无法转化为社会劳动”^[10],并且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无酬劳动,是作为男性榨取女性剩余劳动价值为整个社会提供服务和资源的过程。女性通常被期望承担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的责任,致使其社会参与度减少,经济独立性受到限制。这种情况下,照顾家庭往往被认为是女性的“天职”,女性在家务劳动中的贡献往往被低估,甚至被忽视。相反,男性则通过工资获得了更直接的经济回报,进一步加剧了劳动性别分工的固定化。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雇佣劳动和家务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分化。由于资本本身没有社会性别视角,资本也需要女性成为劳动力,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却仍存在性别歧视和不平等的现象,这表明劳动性别分工与资本主义经济和阶级关系之间仍具有复杂的动态关联。

大工业使女性进入生产过程,不过是女性进入社会生产的行为本身,这进一步为更高级的“剥削”形式创造新的经济基础。20世纪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学说,将家务劳动纳入经济和社会的讨论中,以揭示家务劳动的剥削性质及其对女性的经济压迫,争取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公正补偿和社会认可。女性主义者从政策和法律的角度,提出女性融入公共事业领域的设想,并帮助女性积极投入公共活动领域;工业化进程加速着生产脱离家庭,女性投入较长的劳动时间在工厂从事生产,导致家务劳动转由社会共同承担以减轻其负担,这进一步推动女性参与公共的社会劳动和社会事务。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女性劳动分工反而使女性被压迫得更为严重。家务劳动“工资化”将家庭和亲密关系转化为一种可能的交易关系,资本进入到家庭再生产,将家务劳动的价值仅仅定义为货币支付的价值,从而落入资本主义商品化的逻辑。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莫伊舍·普殊同认为,只有“摆脱了资本主义特有的那种社会建构的(以抽象时间和历史时间二者为形式的)抽象强制”,人们才能“反过来给出了一种在结构方式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高技术和高度发达的社会劳动分工方式的可能性。”^[11]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运行过程中通过性别原则确立劳动分工,女性实际上面临着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和接受工会主义者的欺诈和压迫的两难处境,这是一种沉重的抉择。

三、现代社会优化劳动性别分工的可行性分析

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常被看作衡量一个时代是否文明的试金石。一个文明的社会必然会随着发展不断实现性别的平等和女性的全面发展,只有当所有女性都能参与到社会的生产劳动中时,才能创造出摆脱性别压迫的物质基础并促进社会的繁荣进步。

(一) 科学与技术弥合劳动性别分工的天然鸿沟

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以及新的生产力的涌现,不仅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还会促进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和发展、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生产和家庭生产,其中,革命性的机器——缝纫机,就是女性“靠机械的力量消灭了男工在较重的劳动中的独霸地位”^{[5]543},男工的优势便减弱了。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预测在知识社会、科技时代背景下,劳动性别分工的转向将是由以男性为代表的产业工人为典型转向以女性为代表的信息工人为典型。因为新职业领域的形成,既对男性开放,也对女性开放,使可供女性选择的工作机会增多,女性职位数量大大增加。同时,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和专业性要求不同的人才在各自的领域内深入研究并达到“专精”的程度,形成相互协作的网络,这样一来,男性在公共领域的能力和潜力未必高于女性。在现代社会,平台劳动突破了原有的自然性别差异,基于后天的社会效益和市场需求决定着个人选择工作的自由,人们可以根据兴趣和技能选择适合的工作,使工作没有男女的性别之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性别分工逐渐深化,性别之间出现了不同的经济利益和地位差异。在知识社会、科技时代背景下,分工不再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也扩展到了知识经济和服务领域,人们对于工作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逐渐强调个人能力的发挥、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知识教育培养年轻人的综合能力,使人更好地理解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依赖关系,并且能够在有需要的时候灵活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进而更全面地了解整个生产过程。这不仅有助于个体根据社会需求和个人兴趣进行职业选择,而且还有助于减少分工的片面性对人的发展所带来的局限。21世纪以来,劳动性别分工在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彻底的变革,现代科技使劳动性别分工可以跨越时空的束缚。科技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女性获得了更多参

与重要任务的机会,并且像男性一样,也在不同的领域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但是,在推动现代科技进步的同时,必须防范现代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潜在问题,这就需要对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促进多样性和包容性,以确保科学的公正发展和技术的公平应用,进而实现劳动性别分工的平等。

(二) 新型家庭文化遵循劳动性别分工的平等理念

劳动性别分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种“制度化”的分工,这种“制度化”的分工在其原有的、内在的自然分工基础上便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劳动性别分工不平等的观念就自然而然地根植在人们思想之中。恩格斯认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2]15-16}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人们的劳动,特别是生产劳动,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12],家庭成员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劳动性别分工模式。现代经济的复杂性和全球化的发展也对家庭观念产生着影响,家庭成员追求更多的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导致家庭内部的权力重新分配和角色重新定义。

劳动性别分工不仅是自然的结果,也是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的反映。当在一个社会中介的框架中审视劳动的性别分工时,自然和文化都是重要的变量,同样,当在人类活动整体视域中考察劳动的性别分工时,生产和再生产就不再是相互对立的,相反,女性的再生产、儿童抚养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和组成部分。^[13]在现代社会,新一代劳动力的产生对于维持社会生产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社会财富的生成和分配主要依赖于市场经济和雇佣劳动,家庭不再仅仅是经济单位,也承担着情感支持和社会化教育等其他功能。在家庭的关系当中,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逐渐变得更加平等和民主,夫妻关系和代际关系的平等性得到强化,而且父辈与子女同住可以提供一些家庭支持,有助于减轻女性在育儿上的负担,维持较高的生育水平。新型家庭文化不仅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和互动,还进一步培养出更加健康和稳定的家庭环境,从家庭小范围开始逐步扩展到更大的社会层面,为整个社会的劳动性别分工平等奠定思想基础。

(三) 主体地位的确立彰显劳动性别分工的正义价值

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结构和发展目标导致女性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不平等处境。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始于18世纪末,在这场运动中,女性在形式上获得选举权和相关法律权利的保障,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公民资格,但是,女性在权力分配和决策制定中只是一个虚假的象征,而不是真正有实权的决策者。列宁尖锐地指出:“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的共和国里,妇女都没有完全的平等权利。”^[14]在男性主导的权力结构中,即使有个别女性在政治、经济或其他领域中取得了权力和地位,但整体上仍然存在着男性主导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手握“重权”的女性仅是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因为在社会交往中,性别不平等和父权制观念的深层影响长期存在,导致女性主体地位的缺场,传统的劳动性别分工以及男性优先的继承权和资源分配权,仍然反映出男性主导的结构特征以及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

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市场机制和竞争原则对女性劳动正义产生着重要影响。劳动性别分工被看作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实现劳动力的最佳利用——资本的文明面将女性纳入劳动力市场,增加劳动力供给,使女性与男性享受相同的工作机会。劳动性别分工平等化是社会性别平等的前提,女性只有融入社会和经济领域,才能体现相应的社会经济价值。因为“人的性别并非依赖于先天的生理差异,更多地依赖于社会环境的孕育。”^[15]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科技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快速而广泛的传播,都对女性劳动权利的增加和社会主体地位的确立具有积极作用。正如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艾莉斯·马利雍·杨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当产生于劳动活动中的社会关系组织给男人规定了控制和接触妇女不能接触的生产资料的准则时,他们才能占据优先地位。”^{[8]88}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和开放性正在打破传统劳动性别分工的束缚,促使着女性摆脱“他者”的身份、塑造着整合的人的发展形态,进而使女性劳动正义成为可能。

四、结语

漫长的人类社会劳动史是一部劳动性别分工的发展进化史,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社会经济关系从而对劳动性别分工进行分析与批判,唯物史观在方法论上的洞见要求我们必须在相应的历史背景中考察男性和女性之间劳动分工的不平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性别分工,不仅是社会不平等的体现,也

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的产物,更是资本逻辑对劳动价值的片面理解以及对女性劳动的异化与剥削。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比,今天的社会结构更加多元化,除了传统的阶级斗争,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劳动性别分工的不平等,表现为隐性和系统性的性别困境,使阶级压迫的形式也变得更加复杂,共同塑造着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当前,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更应该“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16],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劳动性别分工的发展趋势,辩证地看待分工的一体两面,为劳动性别分工寻找一条使两性走向团结、使人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宋建丽.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重新理解性别公正[J]. 妇女研究论丛,2014(2):5-11.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N·弗雷泽,周穗明. 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的狡计[J]. 世界哲学,2009(2):39-52.
- [7] 丰子义. 社会批判视域中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2):23-29.
- [8] 李银河. 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 [9]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全译本)[M]. 陶铁柱,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82.
- [10] 闫涛,李樑. 唯物史观视域下性别正义何以可能[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2(2):1-8.
- [11] 莫伊舍. 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M]. 康凌,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459.
- [12] 阎孟伟. 阎孟伟文集(下卷)[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22:224.
- [13] HEATHER B. Marx on gender and the family: A critical study[M].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3:219.
- [14]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80.
- [15] 夏莹. 在哲学与政治之间:女性主义理论自我颠覆[J]. 江海学刊,2012(3):39-43.
- [16]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9.

The Realistic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Labor Gender Divi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YAN Tao, LIU Haoran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The division of labor by gender is a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issue in the study of Marxist theory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class relations. The changes in history and reality are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in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is often regarded as the touchstone for measuring whether an era is civilized. According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history of human society centered on capitalist society and reflects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In this vein, this paper conducts a realistic analysis of the predicament of women in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to reveal their manifestations such as being in a socially subordinate position in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having a rigid division of labor model, and being in a disadvantaged situation in reality. Likewis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of optimizing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in modern society, and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new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system in aspects such 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 family culture, and the status of social subjects. In this sense, this study via the triple analysis of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has bridged the textual theory to reality, and has applied the core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analyze and transform the social phenomena arising from the logic of *Capital-Profit*. Through this approach,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eek a path to human liberation as well as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abor;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human development